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泉州古代教育 陈笃彬, 苏黎明著 ①—济南: 齐鲁
书社,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
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

I ①泉州 ②陈 ③苏 ④教育史—泉
州市—古代 IV ①陈 ②苏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)第 号

泉州古代教育

陈笃彬 苏黎明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号

邮 编 号

电 话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号

印 张 号

插 页 圆

字 数 号千

版 次 年 月第 版

印 次 年 月第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号

定 价 : 元

序

刘海峰

“建国君民，教育为先。”中国向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，官方提倡，民间响应，许多人信奉“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”的古训，勤苦向学。流风所及，至今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。

要真正了解中国教育的现状，就要了解中国教育的历史。要深入了解一个地区的教育现状，则要了解一个地区教育的历史。陈笃彬院长和苏黎明教授热心乡梓，在出版《泉州古代书院》、《泉州古代科举》之后，接二连三，又完成这本《泉州古代教育》，使之成为地方教育史的完整系列著作。对一个地区教育史作出如此系统地研究，这在全国是不多见的。此三本书各自独立，又互为联系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教育史的内容必定包含科举与书院，因为已经独立出版前两书，本书侧重在官学和社学、义学等其他教育形式。但不可避免也会涉及书院与科举方面的内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看来作者是力图写出新的内容，尽量不与前两书重复或雷同。

众所周知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局部的往往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。各个地方的教育史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只要真正深入研究进去，必定会有独特的收获，而且多少总会折射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般特征。例如，作为历史上移民台湾人数最多的地区，泉州与台湾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。本书清代部分，谈到了泉州教育、科举与台湾的独特关系，便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，也具有全国性的

意义。写作最忌人云亦云,炒冷饭。只要有创意,即使是局部的创意,也具有一定的价值。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,因此局部的创新,对全局便有贡献,这也是研究地方教育史的价值之一。

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有一项防止官员徇私的重要制度,即地域回避制度。本地出身的官员一定不在自己家乡任职,在本地当官的人一定是外地人。因此,省级长官都是外省人,州级长官都是外州人,县级长官则是外县人。由于有这种政策的规范,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史上的人物和活动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,一是本地培养出来的名流显宦,如通过学校教育、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进士或举人,但他们一般都在外地做出政绩;二是籍贯是外地但在本地任职的官员,以及他们在本地文化教育上的建树。一般我们写地区教育史主要记述的还是第二方面的内容,而科举史则主要记述第一方面的内容。当然,若从本地考出去,在中央或外地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科举人物,本地教育史也可以带上一笔。本书写泉州教育史,若是某县出身的人物,在本州其他县从政,则更是完全属于泉州教育史的范围。如元代的卢琦是惠安峰尾人,中进士后曾任永春、宁德县尹,本书对他在永春县的教育方面的政绩便有所论述。

一斑可窥全豹,一叶可以知秋。通过一个地区的教育史,往往可以窥见许多全局性的事情。了解一些伟人成长的历史,往往也可给我们许多启迪。伟人最初与平常人没有太大的不同,任何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伟人也都是出自一个很具体的地方。当我去参访一些伟人的故居的时候,便有这种感触,那些文化巨人最初与常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,只是通常在小时候都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教养,能够成就其伟业者,关键还是其日后的努力和机遇,即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。

泉州古代的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,从唐后期的

崛起到宋代的鼎盛,从明代的繁荣到清代的相对式微。其中原因很值得探究,本书也作了不少分析。我认为,明末倭寇之患和清初海禁政策,对泉州(也包括毗邻的兴化)教育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。教育与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,是一种具有很强连续性的事业。在各地人才的激烈竞争中,一个地区的文化接力一旦出现中断,后来要想再赶上或超过其他地区,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很难。要想恢复元气,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。清代不只是泉州地区,实际上整个福建都是如此。因为战乱等原因,清初福建乡试停过两科,人才辈出的链条中断之后,明代福建的科第盛况于是不再。明代福建不时产生状元等鼎甲人物,而清前期上百年时间都未出过状元,使得福建士人望眼欲穿,盛气受沮。直到清中叶以后,才出现“两眼开,状元来”的盛况。泉州古代教育的升沉消长也典型地反映出福建古代教育的变迁。本书对泉州历代教育的兴衰演变作了详细的叙述,对每个朝代泉州教育的特点作了概括,对全面了解泉州教育发展的过程,对其他地区教育史研究,都有参考价值。

本书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。例如,在《南宋泉州的教育》一节中,说“贡院是科举时代地方考取秀才的专门场所。学政在贡院集诸生进行录取秀才的岁科考试称为院试,所以贡院又称督学试院,也叫考棚。但人们习惯上将府州一级的考棚称为贡院,而县一级仍叫考棚。”这里表述的是明代而非宋代的情况,宋代中央和地方的考场都称贡院,且学政是明代的官职,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。当然,瑕不掩瑜,总体而言,作为一本地区教育史,本书已写得相当不错了。先睹为快之后,作者再三嘱我作序,盛情难却,因此草此短引,以表祝贺。

目录

序.....	刘海峰	7
引 言.....		7
一、唐五代泉州的教育.....		7
中唐以前泉州的教育.....		7
唐代后期泉州的教育.....		7
五代泉州的教育.....		7
唐五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	7
二、宋代泉州的教育.....		7
宋代泉州教育兴盛的背景.....		7
北宋泉州的教育.....		7
南宋泉州的教育.....		7
宋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	7
三、元代泉州的教育.....		7
元代泉州的教育环境.....		7
元代泉州的教育概况.....		7
元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	7
四、明代泉州的教育.....		7
明代泉州教育的背景.....		7
明代泉州的官办教育.....		7
明代泉州的民办教育.....		7

明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六四九
五、清代泉州的教育.....	六五〇
清代泉州的教育环境.....	六五〇
清代泉州的官办教育.....	六五二
清代泉州的民办教育.....	六五三
清末泉州新式学堂的兴起.....	六五五
清代泉州教育的特点.....	六五七
六、泉州古代教育的启示.....	六五九
参考书目.....	六六〇
后 记.....	六六一



泉州府的文庙



泉州府学大成殿

引言

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教育泛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与技能,影响人们的思想与意识,增强人们体质的活动。狭义的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,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、有计划、有组织的影响,使其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,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,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,简言之,单指学校教育及相关的活动。本书所阐述的乃是狭义的教育,即发生于古代泉州大地上的学校教育,更确切地说,是封建时期泉州的学校教育。古代的泉州,辖域广大,包括今天的泉州市各区县和厦门、同安、金门等县市。古代泉州的学校教育,可以追溯到晋代,而迄于清朝末年,前后一千六百年。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,也是古代泉州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泉州的学校教育虽然在唐代以前已经发生,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,尤其入唐以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,但是,直至唐代中叶,步伐仍然较为缓慢,教育水平与中原地区比较仍有很大差距。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,既在于泉州社会经济仍然落后,也在于泉州社会各界对教育仍然未能足够重视。中唐以后,泉州社会经济的进步,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,尤其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学,泉州社会的教育热情逐渐被激发起来,虽然官学尚未创办,但家传师授式的私学却随之迅速兴起,成为这期间泉州学校教育形式的主体。五代虽是一个动乱的时期,但泉州社会仍然相对稳定,经济较为繁荣,教育因此得以继续发展。但总体上

看,唐五代的泉州教育,仍然处于初步兴起阶段,比起教育发达的中原地区仍有较大差距。

宋代是泉州教育的繁荣时期。入宋以后,泉州社会长期稳定,经济地位迅速上升,尤其是南宋时期,一跃成为东方大港,经济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教育的作用进一步为社会所认识,尤其是“仕途经济”的刺激,社会对教育的热情持续高涨,教育因而具有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,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。一方面,作为官学的州县儒学,在北宋时期开始陆续创办,形成了以儒学为主要办学类型的官学系统。南宋时期宋王朝南迁,福建成为近畿要地,管理赵宋皇族的机构南外宗正司设于泉州。为教育宗室子弟,泉州创办了另一种官学,即宗学。另一方面,私塾、村学等民间办学形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南宋时期,泉州是朱熹过化之地,为了传播程朱理学,泉州各地创办了十二所书院,成为福建书院制度最为发达的一个地方。各类学校的广泛创设,使泉州出现“学诗书而户弦诵”的盛况。教育的发达,不仅促进了泉州文化的空前繁荣,也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人才,包括一批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的人物,如状元曾从龙、梁克家,政治家曾公亮、吕惠卿,科学家苏颂等,可谓群哲嗣兴,冠裳纓绂。借助这些著名的人物,泉州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,在全国的影响迅速增大。所谓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。

元代是泉州教育的中落时期。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,一是元王朝刺激教育发展的措施不力,官吏选拔主要不以科举为途径,甚至长期弃置科举不用,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,泉州社会对教育的热情因之大为降低。二是元王朝统治时间仅九十年,而在这期间,泉州又先后出现两次较为剧烈的社会动荡,即宋末元初争夺泉州港的斗争,以及元代中后期延续十多年的“亦思巴

受”兵乱,严重地削弱了教育的基础。所以,元代泉州的教育,虽然官学既有儒学,又新增蒙古学、医学和阴阳学这几种形式,还创办了两所书院,而民间办学除私塾外,又增添了社学这种新形式,但是总的看来,却是一个相对低落的时期。这期间,教育的规模与水平显然已不如宋代,在培养人才与繁荣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,更是与宋代不可同日而语,对当时和后代的泉州社会均没留下多大的影响。

明代是泉州教育的再度兴盛时期。促成这种兴盛的要素有三点:一是明王朝对教育高度重视,促进教育的措施也更为有力;二是明代的选士政策再度回到科举的轨道上,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,极大地激发了泉州社会各界对教育的热情;三是明代泉州商品经济发达,海外私商贸易甚为繁荣,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。因此,在经历了元代的中落之后,泉州教育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峰,繁盛程度不仅可与宋代相媲美,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宋代。官方所办的学校,除儒学、医学、阴阳学、书院外,还有卫学。明代泉州的府县儒学,在当时福建各府州中享有盛誉。府县所办的十多所书院,亦具有很大的影响。民间创办的学校,有三个方面甚为突出:一是社学兴盛,高峰时达到几百所;二是创办了多所讲授理学的书院,享誉一时;三是一些著名的理学家自办经馆,影响很大。伴随着教育再度兴盛而来的,则是文化的繁荣和人才的辈出,涌现出大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著作,出现过“一科两元五十八举人”,“一时六相九尚书”的盛况,又产生了相当一些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人物,如李贽、王慎中、蔡清、陈琛、林希元、洪承畴、张瑞图、何乔远等。可以说,明代是泉州教育继宋代之后的又一个颇为风光的时期,故有所谓“人文之盛,甲于闽省”之说。

清代是泉州教育的逐渐衰颓时期。经历了明代的再度兴盛

之后,清代泉州的教育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。一方面,社会各界举办教育的热情仍然不减,尤其清代后期海外华侨也积极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,使各种学校的数量和规模仍然颇为可观。府州县儒学不断修葺扩建,规制较为完备。官民所办的书院达到三十七所,数量超过宋、元、明三代所办书院的总和。社学在乾隆以前仍颇为兴盛,数量犹有几百所。私塾遍及城乡,达到数千所。学校不仅仍是社会的主要教化基地,也仍然为封建国家熏陶出诸如李光地、郑成功、许邦光、陈庆镛等在各方面颇有建树的人物。另一方面,教育出现了明显的颓势,倘若与明代相比较,成就已不那么耀眼。颓势从乾隆中期开始显现出来,原因则较为复杂,既与整个封建教育制度此时已日趋腐败不无关系,又与泉州所处的独特环境有重要关联。颓势主要并不表现在学校的数量,而是体现在学校质量的不断下降,集中反映在人才的培养方面,绩效江河日下,与当时福建其它一些地区比较,显得颇为突出。直至清末,这种颓势不但没有扭转,反而有愈益加剧的趋势。清末废科举办学堂,泉州也闻风而动,府州县城乡纷纷创办起新式中小学堂,至清王朝灭亡时,已办有中学堂四所,小学堂一百一十所,职业学校一所。新办的学堂中,除少数为官办外,大部分为民间所办,其中以华侨和教会办的学堂为多。泉州的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延续千年的泉州古代教育,作为古代泉州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,给古代泉州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不仅仅是读书人,也不仅仅是教师或家长,社会的方方面面,从吏治、举业、文化,以至学术思想、社会意识等,无不受到其影响。它渗入官吏的政绩追求,左右着举业的绩效,丰富了文化的积淀,塑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。明晰这段历史,对于更好地了解泉州历史文化的积淀,不无重要的意义。更为重要的是,千年教育也给后人

留下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。透过历史的迷雾，深入反思这段历史，对于今天如何办好教育，从中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。这也正是撰写此书的基本要义所在。

唐五代泉州的教育

泉州古代的学校教育,严格而言是从唐代开始的。但是,在泉州古代教育史上,唐五代的学校教育,仍然是一个初步兴起的时期。这期间,就其发展状态而言,以唐代大历年间为界限,大体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。大历以前教育虽然有一定发展,但仍然处于颇为落后的状况,而大历以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,而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,因而与中原地区的差距也逐步缩小。

中唐以前泉州的教育

唐代中期以前泉州的教育,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,一直处于非常明显的落后状态,这是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,也基本符合历史的事实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在于:泉州地区的开发要远远迟于中原地区。

泉州原是闽越族人的聚居之地。中原汉民入泉之前,闽族和越族是泉州的土著居民。在闽越族人为主体的漫长时期中,泉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,这是勿庸讳言的事实。考古发现及地方史志的记载也都说明了这一点。建国后,在南安丰州镇旭山庙下村、丰州狮子山、大盈寨山及鲤城区北峰镇埔任村,相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、青瓷器及陶器。这些文物的出



图一 闽越国遗址中的瓦砾

土,说明虽然在公元前数百年,泉州人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器件,用于生产活动和战争,但这些青铜器工艺粗糙,与当时中原的青铜文化比较,显得相当原始,因而它又表明先秦时期泉州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,属于尚未全面开发的地区。

重大的转折出现在中原汉人大量进入泉州以后。秦汉时期,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。三国时期,泉州为东吴政权所统辖,又有部分北方汉族人移居入泉,但文化落后的闽越族人仍是泉州的主要居民。直到这个时期,聚居在泉州一带的闽越人,在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教育活动,至今未见文字记载。西晋末年,泉州较为安定,而西晋统治阶级内部却爆发了诸王混战,中原连年战乱,民不聊生,一部分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为逃避战祸,纷纷南迁福建,进入当时较为安定的泉州。史载当时为避“永嘉之乱”,有八个族群进入福建,即所谓“八姓入闽”。《泉州府志》云:“永嘉二年,中州板荡,衣冠始入闽者八族,林、黄、陈、郑、詹、邱、何、胡是也。以中原多姓,畏难怀居,无复北向,故六朝间仕宦名迹,鲜有闻者。”据说晋江之称,即因晋人“沿江而居”得名。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云:“晋江“在县南一里,以晋之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,故名”。唐《十道志》载:“清源郡,秦、汉土地与长乐同。晋南渡,衣冠之族多萃其地。”到了梁朝,汉族移民大量增加,朝廷决定在南安增设南安

郡,管理闽南事务。隋至唐代,中原汉人继续入泉。这些入泉的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泉州地区,并且同化融合了这一代的闽越遗民,繁衍生息而形成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人社会,从而改变了原来比较落后原始的闽越社会风貌。

中原移民逐渐占据泉州的过程,也正是泉州教育逐渐兴起的过程。徙居泉州的中原移民,有不少是中原的簪纓世胄及地方士绅,曾受过较好的教育,有较高的文化素养,他们的到来,不仅给泉州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,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,对泉州地区的开发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。可以说,正是在中原移民的带动下,泉州的教育从晋代开始逐渐萌生起来。

西晋永嘉年间(307—312),泉州开始有私学的萌芽。当时,北方士民陆续南渡定居晋江流域之后,泉州民间就开始有以家传私授形式出现的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学。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原私学传统的传承,因为从春秋时期起,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就开始了民间的私人办学和讲学。中原士民大量南迁徙居泉州后,承继了这一风气,经久不衰且日趋发展,逐渐形成泉州早期教育形式的私学。但是,直到唐朝初年,教育在泉州社会所占的地位并不高,泉州的教育水平与中原地区比较仍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唐代初期情况有较大变化。唐代在立朝之初,就比较重视教育,从唐高祖至唐高宗初年,曾先后三次下诏,令州县及乡里设学施教。泉州地方官吏也闻风而动,采取一些措施发展教育,使泉州的教育开始振兴。唐武则天垂拱二年(688),泉州守戍左玉铃、卫府左郎将陈元光亲具奏疏,请建州县。朝廷批准并割泉州西南地建漳州,任命陈元光为州刺史。陈元光在《请建州县表》的奏疏中提出:“其本则在创州县,其要则在兴庠序。”(《全唐文》)

把办学校兴教育作为他施政的主要内容。后来在陈元光父子的经营下,漳州设立州学,鼓励漳人读书。与漳州山水相连的泉州,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(713—741)兴建了孔庙,并做设立州学的准备。

据史籍记载,唐建中(781—784)之前,泉州已有“长材秀民通文书、吏事”者,“乡县小民,有能诵书作文辞者”。尽管史籍中尚未见记载这期间泉州有哪种学校,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期间泉州的教育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,没有某种形式的教育存在,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化水平。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但是,同样不可否认的是,直到这个时候,泉州教育的发展步伐仍然较为缓慢。

唐代中期以前泉州教育依然落后,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州县官学不发达。隋文帝统一中国后,从中央到地方都推行官学教育,中原地区的官学出现昌盛的局面。唐朝建立后,于高祖武德元年(618),便下令各地郡县设置学校招收生员。武德七年(624)又下令州县及乡里置学。针对一些州县学校尚未设立或校舍破旧的情况,高宗咸亨元年(670)再次下诏,要求各地从速建立州县官学。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(713—755),各地州县官学已普遍建立。就福建而言,到开元年间,境内设有福州、泉州、建州、汀州、漳州五个州,在福州设有作为督察各州的福建中都督府,并设有都督府学。至于州学,福州、漳州可以确定已设立,有人认为泉州也可能设有州学,主要依据是既然当时社会经济比泉州落后的漳州已设立州学,那么泉州理当也已设有州学。这一推论固然有一定道理,却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作佐证,因而也仅仅只能是一种推论。如此,泉州尽管开元年间在州治建了孔庙,但严格意义上的州学毕竟没有,而各县县学亦处于空白状态。

中唐以前泉州教育依然落后的另一个突出表现,则是私学

也很不发达。在古代,官学的建立与否是一个地区教育的某种象征,而私学的发达与否则是一个地区教育水平的更为实际的体现,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反映出该地区的教育状况。如果说,泉州民间在西晋永嘉年间就开始有家传私授形式的私学,此后,这种私学得以存续且逐渐发展,应是合理的推论。入唐以后,在整个社会开始比较重视教育的背景下,私学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较大的发展,这也是合乎逻辑的。但是,这期间私学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,有关志书都没有明确的记载,甚至没有留下一所当时私学的名称。因此,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:这期间泉州的私学也并不发达,充其量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个人读书之所,也缺乏具有一定规模的较高层次的私学组织。例如,欧阳詹的父母,见到儿子自幼耽于文词,总是担忧地询问邻居:“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?要恐不为汨没之饥氓也?未知为吉凶邪?”可见在那时候,人们比较“嗜利”,即注重经济现实,还不把读书中举当一回事。直到唐中叶,泉州民间还未形成重文的风俗。

中唐以前泉州教育落后的又一个突出表现,则是举业的空疏。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创科举取士制度,唐王朝建立后予以承袭,且加以进一步扩充。但是,直至欧阳詹中进士前的唐德宗贞元初年(793),前后近一百八十年,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早已产生了非常深刻影响的科举制度,在泉州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,社会各界对举业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。这么长的时间内,竟然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进士考试,更别说有人登上进士科榜了。科场上的寂寞无闻,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泉州读书人满足于家乡的“山水禽鱼之乐”,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。这种见解固然不无一定道理,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所在,举业长期空疏的最直接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,在于教育的落后,理由很简单,科举是取士,是一种文化考试,而教育则是养士,是文化传授的载体,科举